

早期中國研究叢書



重寫中國古代文獻

[美] 夏含夷 著 周博群等 譯

上海古籍出版社

早期中國研究叢書

〔美〕夏含夷 著 周博群等 譯

重寫中國古代文獻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重寫中國古代文獻/[美]夏含夷著；周博群等譯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
[早期中國研究叢書]
ISBN 978-7-5325-6516-0

I. ①重… II. ①夏… ②周… III. ①古文獻學—研究—中國 IV. ①G256.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120521號

早期中國研究叢書

重寫中國古代文獻

[美] 夏含夷 著 周博群等 譯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巔輝印刷廠印刷

開本 890×1240 1/32 印張 7.625 插頁2 字數 185,000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800

ISBN 978-7-5325-6516-0

K·1598 定價：36.00元

如有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僅以此書獻給復旦大學裘錫圭教授

中國古文字學家的典範

早期中國研究叢書編委會

總策劃：朱淵清 陳 致

編委（以姓氏筆畫爲序）

朱淵清
陳 致

[美]李 峰 [英]汪 濤
[日]高木智見 唐際根

[美]張立東
曹 峰

叢書序

“早期中國”是西方漢學(Sinology)研究長期形成的一個學術範疇,指漢代滅亡之前(公元 220 年)的中國研究,或是佛教傳入之前的中國研究,此一時期的研究資料和研究方法都自成體系。以吉德煒(David Keightley)教授於 1975 年創辦 *Early China* 雜誌為標誌,“早期中國”這個學術範疇基本確定。哥倫比亞大學近年設置的一個常年漢學講座也以“早期中國”命名。

“早期中國”不僅是西方漢學研究長期實踐中形成的一種實用分類,而且是探求中國傳統文化之源的重要的實質性概念。

從最初的聚落發展到廣大地域內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秦帝國建立,並且在漢代走上農業文明之路、確立起帝國社會的價值觀體系、完善科層選拔官僚制度及其考核標準,早期中國經歷了從文明起源到文化初步成型的成長過程,這個過程實際上也就是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可以說,早期中國不僅奠定了中華文明的基礎,也孕育、塑造了此後長期延續的傳統中國文化的基本性格:編戶齊民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長期穩定維繫;商人的社會地位始終低下;北方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基本都被漢化,帝國疆域的擴張主要不是軍事征服而是文化同化的結果;各種宗教基本不影響政治,世俗的倫理道德教化遠勝超驗的宗教情感;儒家思想主導的價

值觀體系以及由此造就並共同作用的強大的官僚制度成為傳統中國社會的決定性力量，等等。追源這類基本性格形成伊始的歷史選擇形態（動因與軌迹），對於重新審視與釐清中華文明的發生發展歷程，乃至重新建構現代中國的價值觀體系，無疑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早期中國研究不僅是西方漢學界的研究重心，長期以來，也是中國學術研究中取得巨大進展的重要方面。早期中國研究在中西學術交流的大背景下，形成了獨特的研究風格和研究方法。這就是：擴充研究資料、豐富研究工具、創新研究技術，多學科協同不斷探索新問題。

1916年，王國維以甲骨卜辭中所見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稱、世系與《史記·殷本紀》所記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稱、世系一一對照，發現《殷本紀》所記殷代先公先王之名，絕大部分出現在卜辭中。王國維把這種用“紙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互證的研究方法稱為“二重證據法”：“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

出土文獻資料在現代的早期中國研究中顯示出越益重要的作用。殷墟甲骨100年來約出土15萬片，其中考古發掘出土的刻辭甲骨有34844片。青銅器銘文，1937年羅振玉編《三代吉金文存》，著錄金文總數4831件，其中絕大部分為傳世器。《殷周金文集成》著錄資料到1988年止，共著錄了金文11983件。此後到2000年，又有約1350件銘文出土發表。最近二三十年，簡帛文獻資料如銀雀山簡、馬王堆帛書、定州簡、阜陽簡、郭店簡、上博簡等都以包含大量古書而深受關注。

嚴格地說，王國維所說的地下材料，殷墟甲骨、商周金文都還

是文字資料，這些發現當時還不是考古發掘的結果，研究也不是從考古學的角度去研究。真正的考古學提供的是另外一種證據。傅斯年提倡“重建”古史，他主張結合文獻考證與文物考證，擴充研究“材料”、革新研究“工具”。1928年，傅斯年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並立刻開始發掘殷墟。傅斯年在申請發掘殷墟的報告中說：“此次初步試探，指示吾人向何處工作，及地下所含無限知識，實不在文字也。”從1928年10月開始一直到1937年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殷墟共進行了15次發掘，發掘地點共11處，總面積46 000餘平方米，這15次發掘收穫巨大：在小屯北地發掘了53座宮殿基址。在宮殿基址附近還發現了大量甲骨。在小屯村北約1公里處的武官村、侯家莊北地發現了商代王陵區，發掘了10座大墓及一千多座祭祀坑。在小屯村東南約1公里處的高樓莊後崗，發掘出了疊壓的仰韶、龍山和殷三種文化層關係，解決了華北地區這三種古文化的相對年代。在後崗還發掘了殷代大墓。在殷墟其他地區，如大司空村等地還發掘了一批殷代墓葬。殷墟王陵的科學發掘舉世震驚。中國考古學也從開創之初就確立了鮮明的為歷史的特色和風格。為歷史的中國考古學根植於這塊土地上悠久傳承的豐富文化和歷史知識的積澱，強烈的活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始終支撐着中國考古學家的工作。近50年來，中國考古學取得了無比巨大的成就，無論是新石器時代城址還是商周墓葬的發掘，都是早期中國文明具體直觀的展示。

不同來源的資料相互檢核，不同屬性的資料相互印證，提供我們關於早期中國更加確切更加豐富的信息，能夠不斷地解決舊問題提出新問題，又因為不斷提出的新問題而探尋無限更多的資料，而使我們對早期中國的認識不斷深入愈益全面。開放的多學科協同的綜合研究使早期中國研究取得了輝煌的成績。對其他歷史研究和學術研究來說，早期中國研究的這種研究風格和研究方法或

許也有其可資借鑒的意義。

王國維、傅斯年等人是近現代西方科學思想和知識的接受者、傳播者，他們的古史研究是現代化的科學研究，他們開創了中國歷史學和中國學術的新時代。現代中國學術的進步始終是與西方學術界新觀念、新技術、新方法的傳播緊密相連的。西方早期中國研究中一些重要的研究課題、重要的研究方法，比如文明起源研究、官僚制度研究、文本批評研究等等，啓發帶動着中國同行的研究。事實上，開放的現代學術研究也就是在不同文化知識背景學者的不斷交流、對話中進步。我們舉最近的一例。夏商周斷代工程斷代的一個重要基準點是確認周懿王元年爲公元前 899 年，這是用現代天文學研究解釋《竹書紀年》“天再旦於鄭”天象資料的一項成果。這項成果的發明權歸屬韓國學者，在斷代工程之前西方學界已確認了這個結論。將“天再旦”解釋成日出前發生的一次日全食形成的現象的假說是中國學者劉朝陽在 1944 年提出的，他和隨後的董作賓先生分別推算這是公元前 926 年 3 月 21 日或公元前 966 年 5 月 12 日的日食。1975 年韓國學者方善柱據此假說並參考 Oppolzer 的《日月食典》，首次論證“天再旦”記錄的是公元前 899 年 4 月 21 日的日環食（《大陸雜誌》51 卷第 1 期）。此後，1988 年美籍學者彭颺鈞、邱錦程、周鴻翔不僅也認定“天再旦”所記是公元前 899 年的日環食，並對此次日食在“鄭”（今陝西省華縣， $\lambda = 109.8^{\circ}\text{E}$ ， $\varphi = 34.5^{\circ}\text{N}$ ）引起“天再旦”現象必須滿足的天文條件，第一次做了詳盡理論分析和計算，並假設食甚發生在日出之時，計算得出了表示地球自轉變化的相應的 ΔT 爲 $(5.8 \pm 0.15)\text{h}$ ，將“天再旦”的研究又向前推進了一步。夏商周斷代工程再次確認了“天再旦”這一成果，並爲此於 1997 年 3 月 9 日在新疆北部布網實地觀測驗證。

本叢書不僅是介紹西方學者一些具體的早期中國研究的成

果,引進一些新的概念、技術、思想、方法,而且更希望搭建一個開放性的不斷探索前沿課題的學術交流對話的平臺。這就算是我們寄望於《早期中國研究》叢書的又一個意義。

只有孤寂的求真之路才能通往獨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境。值此焦躁不安的文化等待時刻,願《早期中國研究》叢書能夠堅定地走出自己的路。我們歡迎所有建立在豐富材料縝密分析基礎上、富有獨立思考探索成果的早期中國研究著作。

著述和出版是長久的事業,我們只要求自己盡力做得更好一些。希望大家來襄助。

朱淵清

2006/12/2

寫於學無知室

目 錄

導 論	001
第一章 出土文獻的編輯及其對傳世文獻研究的啓示	010
第一節 考古復原後寫本的“整理”	015
第二節 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差異	034
第三節 對中國古書性質的啓示	046
第四節 對儒家經典編纂的啓示	049
結 語	056
第二章 由《緇衣》的重寫看中國經典的形成	058
第一節 初步考慮	059
第二節 起始章節	064
第三節 錯簡和《緇衣》的編纂	069
結 語	080
附錄一 郭店簡、上博簡《緇衣》	083
附錄二 傳世本《緇衣》	100
第三章 汲冢書的發現和編輯	106
第一節 汲冢的發現	107
第二節 文獻的編輯	112
第三節 汲冢書	126
第四章 《竹書紀年》的整理和整理本	151
第一節 《竹書紀年》的文獻史	153

159	第二節	關於《今本竹書紀年》的真偽
167	第三節	《今本竹書紀年》的整理本
171	第四節	《古本竹書紀年》的輯校本
183	第五節	墓本《竹書紀年》及其最初的整理
189	第六節	魏惠成王的在位年代
194	第七節	徙都大梁的年代
197	第八節	墓本《竹書紀年》的還原
207	結 語	
210	結 論	
218	參考文獻	
231	中譯本後記	
233	譯後記	

導 論

十年前，李學勤先生曾在一次演講中宣佈，近幾十年的偉大考古發現使我們必須“重寫”中國上古史的記載，那次演講隨後發表為一篇廣為流傳的文章。^① 李先生的呼吁在中國影響深遠，隨後十年出版的大量書籍和文章都圍繞“重寫”一詞展開。^② 甚至在西方學術界，重寫中國上古史的概念都啟發了新近出版的《劍橋中國古代史》(*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③ 在中英文裏，“重寫”這個詞都有種有趣的歧義。廣義上說，它指的是利用新證據和新視角修改歷史敘事。這明顯是李先生的意思，也是值得我們努力的目標。而狹義上的“重寫”意味着在物質上重新製作一份文獻，這與我們的研究也有很大關係。當我故意用模稜兩可的《重

① 這篇 1992 年的演講後來以“走出疑古時代”為題發表於《中國文化》1993 年第 7 期，之後又作為導論收入以之為題的論文集《走出疑古時代》（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 年）。“重寫”中國史學的呼吁，見論文集，頁 9。演講之後發表的文章，見李學勤《論新出簡帛與學術研究》，載於《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3 年第 1 期；又載於李學勤《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李學勤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年），頁 364。

② 李先生自己再次強調了這個詞；他最近的一本書名為《重寫學術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③ Michael Loewe, Edward L.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寫中國古代文獻》作為書名時，主要是在狹義上使用這個詞。

正如李先生的文章也提到的那樣，我們這個時代並不是第一次需要重寫古史記載的時候。李先生和之前許多人一樣，都特別提到了西漢時期重塑中國書面文化傳統的努力（很明顯，這一傳統大部分毀於之前的秦朝）。首先躍入腦海的是司馬談（前 110 卒）和司馬遷（前 145—約前 86）父子里程碑式的《史記》，其記載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後人對中國上古史的理解。但也許不久之後的另一對父子扮演了更具決定性的角色：他們就是曾領校秘書的劉向（前 77—前 6）和劉歆（前 53—23 年）。實際上正是劉氏父子重寫了秘書文獻。他們將其分為各自獨立的書本和篇目，刪掉多餘的部分，將古文釋為今文，並製成明確的定本。這些定本成為後世所有版本的基礎。

公元前 26 年，漢成帝（前 32—前 7 在位）擔心秘書所藏已亂，命令劉向對其進行整理。我們只能去想像當時的秘書會是什麼樣子。所有藏書肯定都寫在竹簡或木牘上，捆成或大或小的簡冊（一冊即是一篇）。如果要恢復每篇的原貌並在昏暗光線下展開閱讀，其整理工作無疑極為艱巨。劉向發現許多簡冊包含同一文獻的重複材料。如他校對了三百三十二個包含《荀子》片段的簡冊，最後只留下三十三篇，其餘部分均予以刪除。而內容相似的簡冊又往往被冠以不同的標題。如，我們今天看到的《戰國策》就是劉向從題為《國策》、《國事》、《短長》、《事語》、《長書》以及《修書》的六個不同的資料中整理出來的。幾乎所有重複的材料相互之間都有很大差別，儘管在內容上它們明顯來自同一祖本。劉向和劉歆把他們整理文獻時所做的工作寫成了報告。在保存下來的許多報告中，他們指出同一文獻的各文本之間不僅會有個別的文字不同，而且句子和段落的順序也會不一樣，但他們沒有提供任何細節。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系統性地重組了全文，依據的只是自己對文獻內在

連貫性的理解。^① 在製作定本的時候，劉氏父子並沒有複雜的現代學術符號來標明每一個編輯決定。他們僅僅是比較了異文，然後選擇看上去最合理的那個。當時似乎沒有人挑戰他們的編輯決定。而在原簡都毀掉或消失後，劉向和劉歆的定本就成為了這些文獻。

在李先生發表演講的 1993 年，有兩項考古發現使我們認識到劉氏父子和其他古代整理者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他們所整理的古書。當年十月，荊門市博物館的考古學家在湖北郭店出土了一個中等尺寸的墓穴，其位置離戰國時期南方楚國的都城不遠。除了其他工藝品之外，墓中還包含 804 枚寫有文字的竹簡。與此前發現的戰國竹簡不同——它們幾乎完全是律例、占卜和遣策之類的文書——這些郭店楚簡全都寫有哲學文獻，其中還包括兩份長期為人所知的傳世文獻的幾個寫本。考古學家已將墓葬時間定為公元前 300 年左右，因此郭店楚簡成為這些傳世文獻迄今為止最早的寫本。

大約在同一時間，盜墓者在同一地區發現了另一處下葬時間也大致相同的墓穴。1994 年年初，一批裹在泥中的竹簡出現在香港文物市場上，並立即被上海博物館買了下來。這批竹簡的數量更多（總共加起來大概超過 1 200 支），而且包含了更多的哲學文

^① 劉向死於公元前 8 年，是時他已經為此工作付出了二十年。每當他整理完一個文獻，就將其內容和整理時所做的工作寫成簡短的概要，這些概要後來以《別錄》為題編在一起。儘管《別錄》已經失傳，但部分軼文可在嚴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第一冊，頁 332）中找到。劉向之子劉歆完成了整理工作（比如說，我們知道《山海經》就是他整理的），並寫了一份全面的總結，名為《七略》。《漢書·藝文志》就是在《七略》的基礎上寫成的。關於這一作品，可參閱《漢書》（中華書局版）卷三十，頁 1701。更詳細的研究可見曾貽芬、崔文印《中國歷史文獻學史述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頁 28—68。較為簡短的介紹可見 Mark Edward Lewis,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9), pp. 325—332。

獻，其中兩篇也見於郭店簡。

荊門市博物館和上海博物館有一些中國頂尖的古文字專家。他們很快陸續發表了具有較高學術水準的簡文（郭店簡於 1998 年全部發表；上博楚簡已經出了三冊，第一冊發表於 2001 年，第二冊發表於 2002 年，第三冊發表於 2003 年^①）。儘管如此，他們的整理本幾乎立刻遭到了批評。已經有數以百計的文章提出個別字的不同讀法以及全部十六篇郭店簡的不同排序。上博簡第一冊發表兩個月內，對於其首篇二十九支簡就已經有五個完全不同的排序，它們都發表於討論古文字學材料的網站上。這是事後批評最極端的例子。

我們用不着對上述這些感到吃驚。兩座古墓的竹簡早已散開，特別是就上博簡來說，我們不知道有多少本屬於墓中的竹簡被賣給其他人或丟失了。如果你把正在讀的這本書按一行行字剪成紙條，可以想像不同的整理者會以非常不同的順序把它們放回去——這還是在字體清晰、紙條長度相同的情況下。與此相比，我們不難想像整理古代竹簡該有多困難，它們長期埋在地下，並不總能以最原始的狀態保存下來。即使是保存較好的竹簡，簡上的文字也提出了特殊的難題。郭店與上博楚簡都寫於秦漢文字統一之前，可謂完全沒有標準。同一個字可以有兩到三種不同的讀法，同一個詞也可用三到四個不同的字表示，這有點像約翰遜的字典提供“正確”拼寫前的英語。既然如此，學者們自然會以不同方式閱讀這些文獻，也會提出不同的現代漢字釋文。

在這本書裏，我並不打算裁決重寫古書的各種嘗試，更不準備自己重寫它們。儘管我在自己的學術生涯中一直致力於古文字學，也花了多年時間研究商代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甚至發表了一篇

① 譯注：現在已經出到第八冊。

漢代馬王堆帛書本《易經》的翻譯，但我還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古文字知識不足以應付錯綜複雜的戰國文字。我想起大約二十年前，北京大學的裘錫圭教授建議我多熟悉戰國文字，但我沒有採納他的建議。當時我如果聽了他的話，現在也許就更能為郭店和上博簡的重寫做出貢獻。然而以中國的考古學家和古文字學家在過去幾十年（特別是近十年）積累的經驗為基礎，我認為應當重新思考古代整理者們重寫寫本的各種方式，這些寫本在他們眼裏已然成了古書。

劉氏父子的工作也許可以成為這項研究的合適主題，但他們的本子太明確了，以至於其他可能的讀法都被刪得一乾二淨。如果沒有新寫本出土，就根本無法確定他們做了些什麼。^① 幸運的是，另一項考古發現——在很多方面可謂古代中國最偉大的考古發現——為比較古代和現代的整理工作提供了理想的關注點。公元 279 年，盜墓者在河南汲縣挖開一處墓穴，墓主人據說是戰國時期魏國的統治者魏襄哀王（前 318—前 296 在位）。除了下葬時間之外，汲冢的發現與郭店和上博簡還有諸多共同之處。從較詳細的汲冢書發現和整理的報告中，我們得知這些文獻在數量和類型上都與郭店簡以及上博簡相似。更重要的是（至少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釋讀整理汲冢書的工作也和今天一樣充滿了爭議。儘管其原簡早已消失（就像劉向編輯的那些原簡一樣），但公元 3 世紀的整理者提出的不同讀法和排序仍然可以表明他們遇到了哪些問題，並提出了哪些解決辦法。無論就問題還是解決方法來說，我們都會發現它們與當代古文字學家的經驗沒有太大不同。

本書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紹郭店簡和上博簡的

① 下文第一章裏有一個來自《荀子》的例子（頁 26），也許可以表明劉向如何用漢代的標準字替換了當時已經消失不用的原本中的古字。